

《管锥编》与杜甫新解

钱钟书研究丛书 · 第二辑

● ● (德) 莫芝宜佳
马树德 译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钱鍾书研究丛刊

《管锥编》与杜甫新解

[德]莫芝宜佳 著
马树德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钱鍾书研究丛书·第二辑

《管锥编》与杜甫新解

〔德〕莫芝宜佳 著 马树德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石家庄华安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25 印张 240 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5.80元

ISBN7-5434-3091-6/G · 2401

Monika Motsch
MIT BAMBUSROHR UND AHLE
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
PETER LANG
Europae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1994

根据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欧洲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译出

缘 起

钱鍾书先生是我国当代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作家，有“文化昆仑”、“一代鸿儒”之誉。其著作博大精深，融贯古今中外，被视为人类文化中具有经典性的巨著。“钱鍾书研究”已成为当代人文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普遍的重视。“钱学”正方兴未艾。

为全面系统地展现近年来钱学研究的成果，亦为今后的钱学研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们决定编辑出版《钱鍾书研究丛书》。

《钱鍾书研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天地，它以容百家之言、促学术交流为己任，以反映钱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总体面貌、推动钱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目的。它是所有钱学研究者的园地。

我们期望此套丛书的出版，能使目前的钱学研究再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五月

第二章 文 体

前　　言

在道家著作《庄子》中，有一则意味深长的寓言：一只生活在烂泥里的青蛙得意地向东海之鳖讲它井壁破洞中的生活是何等的舒适与惬意。大鳖想亲自去看一看，刚刚伸出前脚就被井口绊住。于是大鳖便向青蛙描述大海的壮阔无边，结果青蛙被吓得差点儿昏了过去^①。与这个寓言相似，麻雀和大鹏之间的对话进行得也不顺利。世界观的差异阻碍了它们彼此间的理解与沟通。

庄子的寓言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问题，这问题也正是本书探讨的中心，即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否可能。我将循着中国学者钱锺书在其主要著作《管锥编》中所指示的路径走，以求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走进《管锥编》是不容易的。初看，它像是一片多种语言组成的“引文丛林”，作者思绪似在时空中随意跳跃；再看，书中使用

^① 见《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的又不是现代汉语，而是文言。读它，就如同我们西方人读一本用希腊文或拉丁文写成的有关欧洲文学的书。最大的困难当是那些难以尽数的引文，它包容了从公元前的周朝直至20世纪的文学经典，因此阅读时必须清楚它们的背景脉络。有时翻检查找也无济于事，因为书中所引多是一些难以接触到的著作。

中国的许多老学者读书破万卷，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对历代文学名著烂熟于心。钱著的理想读者首先就应像这些学者一样熟谙中国三千年的古典文学。其次，也必须熟读佛教经典、白话小说及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懂得中国的戏曲、笔记、笑话和俗语格言。此外，还应通晓重要的西方语言，熟悉用这些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在这样高的要求面前人们往往会望而却步，然而又恰恰是这些困难“引诱”着人们去探求。

钱鍾书的著作首先是为中国人写的。我则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对它加以审视。突出的问题依然是：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如此巨大，把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放在一起考察是否可能？我们能否把西方的范例、西方的术语乃至西方的评断运用于完全属于另一种的中国文学？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途径？这就涉及到了中西方的比较文学问题。

书的第一部分论述的是《管锥编》，这一部分起的是定向作用：除了介绍钱鍾书的生平与著作，还将综述《管锥编》的“中西法”。“文体”、“母题”以及“宇宙观”三章将由近而远地铺出三条能使我们较易进入这片“丛林”的“通道”。

同时，《管锥编》中所容纳的大量材料也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机会。我选择了传统的中国哲学作为出发点。于是我们将不断地看到诸如“含蓄”、“空灵”、“天人合一”等出自中国各个哲学学派的概念。19世纪和20世纪，不管在中国还是在

西方,这些概念已被人们毫无批判地接受使用,由此给人的感觉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着难以共通的本质差别。与此相反,《管锥编》却提供了把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放在一起加以考察的可能。

从内容上看,有些题目,像通感(联觉)、镜鉴、倩女离魂法等,都很少为汉学家所关注。《管锥编》纵横古今,引证了大量我们并不熟悉的中国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这就构成了它的巨大魅力。故此我在自己的书中把中文原文与绝大部分出自我自己之手的德文译文并列。对《管锥编》中的西文引文,我尽可能地一一核实,发现舛误,则予校正。

本书第二部分论述的是唐代诗人杜甫。在这里我告别了钱锺书的《管锥编》,为的是把在第一部分中形成的理念验证于实践。在中国,杜甫被尊崇为最伟大的诗人,但在西方却很少有人研究,且没有给予他应有的评价。我选译了 25 首杜诗并加以诠释,为的是探求中西方存在差异的原因并试图对杜甫作一新解。这一部分同样是受到了《管锥编》的启示,但内的论点和评价又都是我自己的。

目前,在中西比较文学中,人们强调的多是差异而忽视了彼此间的共同之点。许多学者都认为,应该用中国的观点去看待中国文学而不应强加进西方的观点^①。可实际上,中西文化虽有很大差异,但毕竟存在着许多共同点。恰恰因为中西方文学的巨大差异以及后来的相互影响,这些共同点才给了我们特别的启示。

^① 比如夏志清,他这样写道:“现在,在一些研究中国小说的西方学者中,我们确实有可能注意到越来越传统的中国式批评,他们希望摆脱自己的文化偏见来了解中国文学。”

它使我们看到文学规律亦即共同的文化语言，正是这种文化语言促成了中西方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有这种共同的背景作衬托，差异与艺术特征也就愈发显得清晰而突出。

最重要的是，共接点使中西方的思想得以相互解释，相互批评^①。观照中国文学，西方的例证和术语有着双重功用：一是补充修正，二是使那些长期受压抑而不得张扬的中国文学观得到认可。

西方学者同样渴望着观点的交流。这样就展开了一个视野，从而逐渐填补西方比较文学中那些明显的资料空白。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角色设想为青蛙，把陌生的东方设想为大鳖。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就一定比我们优越，而是说它像一面镜子，可以使我们从外面审视自己的视野并借此从井底跳出来。

^① 歌德曾颇有远见地以欧洲为例描写过这个进程，他说：“……现在，在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密切交往中，我们将相互纠正。这将使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得到巨大收益并将不断地显现出来。”(1827年7月15日)见 JOHANN PETER ECKERMAN: *Gesprae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Wiesbaden: Brockhaus, 1959, 第199页。

目 录

前 言 (1)

上 篇 ·《管锥编》

绪论 中国的比较文学 (3)

一 清代的开创性研究:林纾和严复 (4)

二 悲剧讨论:王国维及其追随者 (6)

三 五四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9)

四 八十年代的开放 (10)

第一章 题材范围与方法 (13)

一 钱锺书 (13)

二 《管锥编》的一般特征及其研究现状 (24)

三 逐点接触法 (28)

四 《管锥编》是一部比较文学著作吗? (33)

第二章 文 体 (43)

2 目 录

一	中国“含蓄”的文体典范	(43)
二	《管锥编》的文体	(47)
三	通感：中国式“联觉”	(65)
	(一)西方的通感研究	(65)
	(二)《管锥编》中的通感	(72)
四	“夸饰在用”	(81)

第三章 母 题 (97)

一	中西母题比较中的问题	(97)
二	镜子母题	(100)
	(一)西方的镜子母题	(100)
	(二)汉学界的镜子研究	(108)
三	《管锥编》中的镜子	(113)
四	中西母题研究法	(126)

第四章 宇宙观 (141)

一	天人合一	(141)
二	《管锥编》中的宇宙观	(149)
	(一)处在宇宙中心的人	(149)
	(二)冷漠的宇宙	(157)
	(三)诗可以怨	(162)
三	天人对立	(165)

下 篇 · 杜 甫

引言 中国的和西方的杜甫研究 (177)

第一章 对 仗	(188)
一 杜甫——文体风格的样板	(188)
二 诗——第一首至第五首	(192)
三 战斗的龙:杜甫风格	(206)
(一)与《管锥编》的文体比较	(206)
(二)与西方“蒙太奇技巧”的接触	(213)
 第二章 自我表现	(219)
一 中国的和西方的杜甫形象	(219)
二 逝世者:“坦腹江亭暖”	(228)
三 官吏:“一去紫台连朔漠”	(238)
四 疾病:“天地一沙鸥”	(254)
五 自我发现	(266)
 第三章 召遣鬼神	(279)
一 杜甫诗中的神	(279)
二 诗——第二十至二十四首	(282)
三 秋兴八首	(298)
四 水与光的映像	(305)
 馀论 在《管锥编》启示下的杜甫新解	(310)

上 篇

《管 锥 编》

我个人希望，这部书的出版，能为文学史上的研究者、学者和批评家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让他们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局限于传统的文学史框架。同时，我也希望它能成为文学爱好者们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扇窗口。

《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对《周易》、《诗经》、《左传》、《国语》、《楚辞》、《庄子》、《史记》、《汉书》等古籍的注释与研究，也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新诠释。书中首次提出“文学批评”这一概念，并将其与“文学研究”区分开来，从而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管锥编》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管锥编》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书中首次提出“文学批评”这一概念，并将其与“文学研究”区分开来，从而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管锥编》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绪 论 中国的比较文学

就个人而言，钱锺书并不赞成“比较文学家”的称号^①。尽管如此，只要回顾一下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还是足可以使我们理解那产生了《管锥编》的政治文化背景。

中国的比较文学可以追溯到公元 3 世纪，那时，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翻译佛教经典以及与印度僧人的直接交往导致了对语言及翻译问题的研究^②。而中西比较文学则始于中西方开始接触的 19 世纪。一般分为三个时期：晚清、1919 年的五四运动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比较文学在这三个时期的发展是跳跃式的：发展，停顿，然后再从零起点上重新开始。

① 杨绛曾这样记述钱锺书：“现在他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想起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的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见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杨绛作品集》第 2 集，第 141 页。

② 参见孙景尧《比较之比较：中国古代比较文学研究渊源及其特点的追溯》，《中国比较文学》第 4 期，第 144—158 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年。

一 清代的开创性研究：林纾和严复

第一个介绍西方文学的中国人是翻译家林纾(1852—1924)。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不下170种，正是这些译著，使人们认识了西方的许多著名文学家，如狄更斯、司各特、斯威夫特、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大仲马、小仲马、莎士比亚和柯南道尔等等。提到林纾，他的巨大创造性，他的语言才能及其译笔的自然流畅，会使我们立即想到德国伟大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弗朗茨·库恩^①。

迎合当时的时尚，林纾的翻译用的不是白话，而是文言。他不懂外语，翻译时主要依靠合作者的口述。林纾把西方作家同中国古典作家如司马迁(约前145—前85)、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等相比照，因此赢得了大量的读者。钱锺书的少年时代也曾为林纾的译作所吸引，后来，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林纾的翻译》，内中，结合林纾的翻译生涯，指出了其译作的长处与不足^②。

遗憾的是，在中西方建立起联系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文学，而是大炮。鸦片战争中，用暴力打开中国大门的结果是，中国像林则徐(1785—1850)那样的爱国者纷纷把注意力集

^① 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 1884—1961)，中国文学翻译家。曾将多部中国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译成德文，其中包括《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儿女英雄传》、《子夜》等等。

^② 原载《文学研究季刊》1964年，第1期，后收入《七缀集》。

中于如何对付西方的武器和战舰^①。就是思想家严复(1854—1921)也担心中国会被外国“瓜分”，他写道：

再过三十年，... 我们所有的附属国都将消失，它们将像牵着老牛鼻子那样牵着我们走^②。

不同于他人的是，严复苦苦寻找西方占据优势的精神原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后，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斯密的《原复》(一译《国复论》)和斯宾塞的《社会通诠》等学术著作。他认为，西方强盛的原因在于浮士德式一普罗米修斯式的世界观，在于人们看重强者生存、驾驭自然、奋斗不息和英勇无畏，而这些恰与中国消极的世界观相对立。

对“英勇”西方和“消极”中国的想象所产生出的巨大影响，可以从激进的改革家、哲学家谭嗣同(1865—1898)身上看到。在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尽管33岁的谭嗣同完全有可能出逃，但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就义。谭嗣同想用自己的死给后人留下影响未来的榜样。

严复借助西方以求精神革新的政治目标“传染”给了文学，中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传统的文学真的跟我们的大炮一样劣于西方？这过错或许在于中国的贫弱？

^① 参见赫尔伯特·弗朗克和罗尔夫·特劳蔡特尔著《中国的封建王朝》第10章“西方的入侵和帝国的衰亡：屈辱的中国(19世纪)”及第11章“走向20世纪的中国”。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68。

^② 见 BEN 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S. 31.